

开宗创派的江西佛教丛林

孙家驹

佛教于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中国，东晋前的主要活动为译经，东晋出现佛教学派，标志中国佛教开始走向独立发展；研孕至唐，名僧辈出，开宗创派，高潮迭起，天台、三论、唯识、华严、净土、禅、律、密八宗风行，盛极一时；唐代后期，禅宗之南宗异军突起，席卷南北，几乎垄断了佛坛。此后，禅宗、净土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并远传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以至欧美，至今影响很大。

禅宗是中国独创的宗派，分南北二宗，北宗衰微，南宗独盛，禅宗5家7宗的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5家亦称5宗及北宋时由临济宗衍分出的黄龙、杨歧2宗均出自南宗一门，而这5家7宗全都源于江西。江西是净土宗的发源地，更是禅宗5家7宗的发源地，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之特殊，影响之深远，罕有其匹。

庐山东林寺是净土宗的发源地。东晋佛学泰斗慧远(334~416)居庐山36年、东林寺30年，译经著书，弘法立说，融儒、道于佛，结“白莲社”，倡“净土法门”，奠净土宗之基石，开佛教中国化之先河。东林寺因之而成为当时南方佛教的中心，尔后净土宗的祖庭。净土宗既是佛教的一大宗派，又是佛教各宗同修之“共宗”。正因为它具有如此影响力，故远传国外，至今仍盛。东林寺建成于公元386年，唐盛时有殿堂僧舍数百间，僧侣数千人，藏经数万卷，号称“万僧之居”。1978年后全面修复的东林寺为一组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寺庙建筑群。

吉安青原山净居寺是禅宗南宗青原系

的祖庭。唐名僧行思(671~738)在青原山说法传徒，名动天下，得高足希迁，继弘其法，宗匠辈出，与马祖道一并驾齐肩。希迁高足有二，一为惟严，一为道悟。惟严传昙晟，昙晟传良价，良价传本寂、道膺、匡仁而创曹洞宗；道悟传崇信，崇信传宣鉴，宣鉴传义存，义存有二高足，一为文偃，一为师备，文偃创云门宗；师备传桂琛，桂琛传义益创法眼宗。青原行思一系衍三宗，堪称佛教史上的奇葩。现修复的净居寺为一组明代风格并富有江南庭院色彩的大型建筑群。寺前山口处有一座额首为颜真卿手书“祖关”二字的石雕牌坊，祖关至高，青原山当之无愧；寺门横额“青原山”三字为文天祥手书，更显示了青原山的历史厚重；寺后有行思禅师的“七祖塔”。

宜丰洞山普利寺、宜黄曹山寺是曹洞宗的祖庭。良价(807~869)在宜丰洞山建普利寺，著书立说，弘法传徒，倡洞山宗旨，僧侣风从，得高足本寂、道膺、匡仁等弘扬，成就一大宗派。本寂(840~901)在宜黄曹山寺大弘洞山宗旨，宗风振播。良价、本寂均被尊为曹洞宗祖师。道膺(835~902)在永修云居山真如寺弘传曹洞宗，僧徒多达千余人。匡仁在金溪疏山弘传曹洞宗，参学问法者甚众，文偃禅师创云门宗前亦来参学。曹洞宗经道膺、匡仁弘扬，远传至日本和朝鲜半岛。洞山现存佛塔100多座，良价墓塔保存完好，普利寺尚存清代重建的后法堂和僧房，其它也得部分修复，曹山寺及本寂禅师墓现均已修复。曹洞宗是日本佛教界信徒最多、实力最

雄的宗派。

靖安宝珠峰宝峰寺是禅宗南岳系的灵山宝刹。马祖道一(709~788)在江西大建寺庙,广弘禅法,高僧云集,声震南北佛界,为禅宗南岳一系奠基立下头功。百丈怀海得其“大机”,黄檗希运得其“大用”,各成一派宗师,并衍化出沩仰、临济二宗。宝峰寺始建于唐天宝年间,是马祖道一的重要道场和舍利供奉处。该寺1993年重建,历时7年,规模空前,占地逾万平方米。寺后七岭奔来,左右两峰环抱,地形得天独厚。

奉新百丈寺是沩仰、临济二宗的发源地。马祖道一高足怀海(720~814),在百丈山创立禅院,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制定《禅门规式》,成为全国寺庙所遵循的《百丈清规》;二是倡导并力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家风,成为中国佛教界所倡导的优良传统,此两大创举均为佛教丛林千年传颂。怀海有两大高足,一为灵祐,一为希运。灵祐奉师命至湖南大沩山弘法,得慧寂,慧寂至宜春大仰山建寺(后名栖隐寺),号称小释迦,弘法近50年,高徒广布,形成独具特色的仰山门风,创沩仰宗。希运在宜丰黄檗山弘法,得义玄,义玄至河北正定县建临济禅院,高僧满座,后成多方宗主,各弘化一方,终创临济宗。百丈寺现尚留有唐柳公权手书的“天下清规”石刻。

修水黄龙山黄龙寺为黄龙宗的祖山祖庭。临济宗发展至北宋仁宗、神宗时,临济七世宗师慈明、楚圆两大高足慧南和方会分别在修水黄龙山、萍乡杨岐山弘法,盛极一时,形成临济宗两大派。临济宗一分为黄龙、杨岐二宗,至此,禅宗由“一花五叶”发展成“五家七宗”。慧南(1002~1069)中年名声极盛,晚年住持黄龙山黄龙寺,从慧南得法者多达80余人,不仅全国各地许多名山大刹皆成黄龙宗道场,而且远传至日本。清代的黄龙寺规模宏伟,有山门、四殿、十一院、八堂寮室和八大景观等。现存遗迹有“法窟”和黄庭坚手书“黄龙山”摩崖石刻、灵源桥、观音井、祖

师塔、祖心塔等。

萍乡杨岐山普通寺是杨岐宗的祖山祖庭。方会(992~1049)住持杨岐山普通寺,博采禅宗诸家之长,弘法创新,名震海内外,经后世宗匠弘传,形成与黄龙宗并驾齐驱的杨岐宗。杨岐宗高僧辈出,十一世纪末至十二世纪,达至极盛,势夺禅宗诸宗,元代以后,远传海外,并复称临济宗,二战后又传至欧美。国外临济宗人皆为杨岐、黄龙宗之法裔,朝鲜半岛佛教徒,百分之八十以上为曹溪宗人,而曹溪宗则是由临济宗即杨岐、黄龙宗衍化而来的。杨岐宗的历代名僧在民间也有盛传,如济公和尚、布袋和尚、石头和尚和日本的一休和尚等。杨岐山普通寺占地7000平方米,规模壮观,有唐代甄叔禅师塔,乘广禅师塔和唐碑、唐柏等。

永修云居山真如寺为禅宗传承接续之地。云门、法眼二宗创宗祖师文偃(864~949)、文益(885~958)均出自青原系,其开宗创派过程中,江西名山古刹多为其道场,其中文偃在云居山门寺,文益在抚州崇寿院(后改名地藏寺)住静弘法。南宋之后,沩仰、云门、法眼三宗后继乏人,渐趋衰微。现代禅宗泰斗、中国佛教协会首任名誉会长虚云(1840~1959)禅师于1953年驻锡云居山,结茅而居,重建真如寺,力弘百丈家风,率僧众开荒种植自给,海内外竭诚施助,终使古寺重光。虚云在传承临济宗的同时,兼传承曹洞宗,并应请为法眼宗第八代祖、云门宗第十二代祖,沩仰宗第八代祖,各下传一批法嗣,使中断的三宗法脉得以接续,使禅宗5宗再度并茂齐芳,也使云居山真如寺成为全国佛教徒万众朝拜的圣地。真如寺于1982年后再度扩修,现在的真如寺为占地8000平方米的大型寺院建筑群,附近还有瑶田寺、圆通寺、祇树堂、云门寺上方庵及近百座古墓塔等。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激荡、吸收、渗透的过程,这个过程既使佛教被改造成中国(下转83页)

雅。正德时期由于所用青料比较多样，致使青花呈现出或深或淡而带灰色，所谓“混青”现象比较严重。

明代后期的嘉靖、万历年间，据说采用回青和石子青混合剂制成的青料，因而器物的青花呈蓝中微泛褐紫的浓重鲜艳的色调（封二,6）。

四、产地

明代时景德镇已成为全国瓷器的主产地，特别是成功烧造青花瓷器，它是在元代青花瓷生产的基础上发展的，其匠师队伍的庞大，先进技术的的优势、产品质量的上乘是其他地方窑场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到明代中晚期，官府逐步对民窑青花器的烧造从图案题材的选择范围，到高级匠师的控制方面都逐渐放开，青料来源也可进行充分的选择，优质矿料的选择使民窑青花瓷制造技术得到很大的提高。瓷业制造处于兴盛时期，其时窑场遍布整个景德镇地区及周边地带，所产品种既有高档的精致瓷品，更有大量民间日用生活器皿。其产品运销全国大部分地区，海外也有广阔的市场。常州府县与景德镇相距不远，可说是近水楼台，得之方便，而事实上景德镇的青花瓷器产品早在明代前期就已源源不断地运销到这一经济重心地区。到了明代运销量更大，既有大款商贾成

批贩运的，也有江西小贩肩挑沿街叫卖的。所以说这一批青花瓷盖罐基本上都是来源于江西景德镇地区的，它是江西运销常州府县地区除木材外的重要商品之一。

五、结束语

这批青花瓷盖罐，由于其出土的墓葬大多有可靠的下葬年代依据，据此也可确定器物的相应年代，为器物的断代提供了参考标尺。

民窑青花瓷器的装饰题材是当时社会习俗和文化观念的直接反映。这种来源于民间社会现实生活的充满活力的题材，其情趣盎然的内涵和粗犷洒脱热情奔放的艺术表现，可说是青花中独特且最具艺术魅力的部分，本文写作的目的，在于从一个方面来揭示民窑青花瓷器的价值。长期以来，民窑青花瓷为古陶瓷研究界多数人所忽视，以致于有关科研成果寥寥无几，像样的著录更是凤毛麟角，希望我们的文章能引起学者同仁们的兴趣，以对民窑青花器的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

注释：

《中国陶瓷史》(第372页),1982年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 许智范)

(上接89页)

化的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国际文化交流等产生深远影响。江西佛教自东晋至宋皆为全国重镇，其对江西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使江西成为宋代理学的中心，理学开山祖周敦颐（1017~1073）和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均长期讲学著述于庐山，朱熹与陆九渊（1139~

1193）的长期争论和激烈的“鹅湖之辩”在当时影响很大，朱讥陆为“禅学”，陆讥朱为“支离”。理学关于宇宙本源的思想，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理学的出现使儒学和哲学产生了重大变化，它影响到尔后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也影响到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

(责任编辑 彭适凡)